

诗文一理、聚观通证： 杜甫诗与文章学关系综论

谷曙光

〔摘要〕杜甫诗与文章学有着盘根错节的密切关联。杜甫诗具有很强的日常应用性，很多时候可以诗代文，实现文章之用，故能兼备文章众体，极大地拓展了诗国疆域。后世以文章学之法注杜、评杜，开创了杜甫诗学研讨的新视角、新局面。在研讨文法论杜的同时，聚焦其中的两个重要维度——“太史公笔法”与“最擅叙事”，可知杜甫及其诗乃是践行体现诗文一理、聚观通证的典型代表。杜甫对诗法、文法的兼收并蓄、调和运用，令杜甫诗大放异彩；而后代学人以文法注杜、论杜，又更充分地发明了杜甫诗之妙；即便是文章学的研讨，亦不能忽视杜甫诗的存在。诗与文章，在杜甫诗上既有横向共时的交融，又有纵向历时的贯穿，实现了道理相通、错综成就、合而见义。一言以蔽之，杜甫既是诗学之典范，亦成为文章学榜样。

〔关键词〕杜甫；文章学；关系；诗文一理

如果对历代的文章学论著、杜甫诗注本进行研读检索，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作为诗人的杜甫，不但有一定数量的文章传世，更时常出现在历代文话等文章学论著中，其频率甚至超过某些专门以文章名家者，而在汗牛充栋的注杜文献中，以文章学之法论杜甫诗，更属一大宗。这足以说明，杜甫诗与文章学关系密切，其间的关联干系当是一篇大文章，目前学术界对此关注甚少，故很有深入挖掘的学术空间。

一、从杜集看杜甫诗与文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章有广、狭的不同定义。简言之，广义的文章，包括散文、骈文，乃至诗、词、赋等；而狭义的文章则专指骈散文。如取狭义，从《杜工部集》本身，能否见出杜甫诗与文章的关系？答案是肯定的。杜集包括杜甫的诗和文，论篇幅以诗为主，论成就更是诗远过于文。^①杜甫《宗武生日》有句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②这是老杜的教子诗，其中“熟精文选理”一句常被挑出来单引，但笔者认为，上下文结合着看或许更恰当。“诗是吾家事”显出老杜对作诗的无比自信，而“熟精文选理”或可视为成就诗人的一大前提基础。杜甫的体大思

作者：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mrgsg88@163.com。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内外杜甫影像、杜甫诗意图的文献考订与综合研究”（23XNL005）阶段性成果。

① 杜甫成就远过杜文，殆无疑问，但亦有为杜甫文章翻案者。宋人蔡絛《西清诗话》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其语磊落惊人。或言无韵者不可读，是大不然。”（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546页，中华书局，1980。）

②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26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按，本文引杜甫诗、杜文，皆据此书，不一一出注。

精,离不开对前代经典的研习,而在各种经典里,《文选》无疑对杜诗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杜甫本人极为受益,故他又教子精研,可谓经验之谈。众所周知,《文选》是以骈体为本位的文学总集,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标准,杜甫对其精熟,当是对骈体文的构思和工巧骈俪了然于胸,这对作诗分明有着极大的借鉴参互作用。概言之,“熟精文选理”可看作杜甫诗与文互动的渊源和基础。

关于杜诗风格的概括,见仁见智,但“沉郁顿挫”无疑是流传最广、最为人认可的说法。而这恰恰来自杜甫本人的文章。其《进雕赋表》有云:“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这说明老杜对扬雄等赋家下了极大的功夫,自认为差可比拟,于是用“沉郁顿挫”来总结自己的文风。形容自家文风的话,日后竟成为其诗风格的最佳概括,老杜或许始料未及,但足可看出杜甫的诗和文原是不分家的,二者有着一些内在的、共性的风格特点。总之,“沉郁顿挫,随时敏捷”可谓杜诗与杜文花开两朵,但它们异色同香、异体同质,有着密切的艺术关系。

在后世的诗文论著中,评论诗与文互相影响、作用,发生艺术关系,有“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两种专门的提法。在创作实践中,杜诗有太多借鉴文章作法的地方,此一方面,杜甫显然是为韩愈导夫先路的,笔者已有相关研究。^①与此同时,杜文也借鉴诗的做法。当然,杜甫的主要成就在诗,文的成绩不够亮眼,于是以文法作诗成为主导的一面,而以诗法为文,反而叫得不够响了。

覆按文献,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已有“以文为诗”^②之说,而南宋陈善的《扞虱新话》复有“以诗为文”^③的提法。陈师道是从尊体的角度言之,对“以文为诗”略有不以为然之态度。相比而言,陈善之说显然更值得重视:“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④。杜甫成就最高的是诗,韩愈成就最高的乃文,但陈善偏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就存在着一个语言重心的问题。此前的研究,多把重心放到后面,即侧重韩愈的诗、杜甫的文,韩愈是借鉴文章作诗,杜甫是借鉴诗歌作文。但笔者以为,把此句理解成互文,似也未尝不可。推测陈善的本意,或许仍是偏于杜诗、韩文的,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擅长的文体。如认可互文相补、参而见义,此句不妨理解为韩愈的文章犹如诗,杜甫的诗犹如文。这无疑是一个新思路。无论如何,“杜以诗为文”说明杜甫的诗文互渗早已为宋人所关注和公认。

二、杜诗与文章、文章学:盘根错节的缘分

先有文章,后有文章学。祝尚书认为:“(文章学)是研究文章写作的学问,与人们所熟悉的诗学、词学性质相似。”^⑤这可视为现代学术层面的文章学定义。吴承学则指出:“‘文章学’应视为动态的、有弹性的历史概念,中国文章学系统兼具开放与稳定的特点。”^⑥文章学确有广义抑或狭义、古代抑或现代等不同视角的定义/界定。关于杜诗与文章、文章学,本文执简驭繁,在文献上,充分考虑历史语境,对史料作恰如其分地分析;在理论阐发上,则依现代学术,诗文分而治之。故概念的清晰辨别与严谨定位,是展开本话题的基础。

先看杜诗与文章的关系。杜甫自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文章一小

① 参见谷曙光:《艺术津梁与终极目标——论韩愈作为宋人学杜的艺术中介作用》,载《杜甫研究学刊》,2005(1);谷曙光:《陈师道:学杜而得韩——略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诗歌的接受及其比较》,载《杜甫研究学刊》,2009(4)。

②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303页,中华书局,2004。

③④ 陈善:《扞虱新话》,载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499、499页,中华书局,2017。

⑤ 祝尚书:《关于文章学研究的几点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1)。

⑥ 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12)。

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岂有文章惊海内”（《宾至》）、“庾信文章老更成”（《戏为六绝句》），诗人对文章的接受和认知，也是采取广义的文章概念。

宋代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人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①由此条可知，宋人所谓文章，亦是包括诗的。又，黄氏《与王观复书》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②。再次把杜诗与韩文对举，并非偶然。诗与文，皆要有来历、合事理、顺自然，而杜诗、韩文在这些方面都是相通的。南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诗也包含在文章之内。

概而言之，说杜诗包括在文章中，宋以前可以如此讲。但宋以后，诗与文章分途日益明显，特别是明清以来，杜诗与文章虽未彻底分道扬镳，但多看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不管杜诗与文章、文章学怎么离合，其间的关联始终存在，而且“剪不断、理还乱”。

若以文章学观照杜诗，其荦荦大者，首先是文道关系、纲常伦理的视角。中国古代讲究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辞章，杜甫显然是这方面的优等生。文以载道，乃古代士人的共识，而杜甫是“诗以载道”。黄庭坚称道：“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激发而然。”^③杜甫忠君爱民，一饭未尝忘君，堪为古代士人典范。李纲也赞誉：“其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形容、色泽而已。”^④越是国家危急、人民苦难之际，杜诗的价值越能得到充分体现。“少陵气节”，令杜诗尤长于载道，体现为仁心广大、悲天悯人，更令杜诗的地位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历代的文章家于是常引杜诗为标格，不敢丝毫轻慢。

杜诗之载道，不止鼓吹风雅，且事关名教。赵次公云杜甫“出处，每与孔、孟合”^⑤，这对古代读书人就太亲切了。杜诗的崇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经学为参照的；而老杜也确实纯熟经史，故诗中时常引经用史，信手拈来。陈善《扞虱新话》曰：“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⑥已经把杜诗抬到了儒家经典的高度。清人潘德舆指出：“鄜州学孔庙戟门则祀子美。夫以子美之诗，挟经心，执圣权，以从祀孔子庙，不较胜于唐人之从祀何休、王弼哉？元顺帝追谥文贞，为千古诗人之仅事，要亦当之而无愧色者也。”^⑦配飨孔庙，这在诗人中，更是独享尊荣的。

再言技的层面。在诗歌创作中，如分体言之，杜甫的古体借鉴文章作法的地方更多，如章法、结构、布局等；当然，近体也屡见不鲜，如律诗的起承转合。从批评言之，文章学经常论及的气格、段落、技法、鉴赏、风格等关键词，杜诗无一不可谈，且皆能谈出门道学问，于是文章学或作类比，或径为榜样。此层下文详论，兹不赘。

总之，杜诗与文章、文章学交织汇集的地方太多了，从创作到批评，从文献到技法，从比较到理论，不一而足。杜诗注定与文章、文章学存在着盘根错节、牵丝挂藤的复杂关系。

三、杜诗的日常应用性：兼备文章众体

文章最讲日常应用，而杜诗在这方面也是“风景独好”，甚至可以说是开疆拓土、突破前人的。杜甫既然“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⑧，其诗自然“兼备众体”——按，此词本是

①② 黄庭坚著，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425、420页，中华书局，2021。

③ 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载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74页，齐鲁书社，2002。

④ 李纲：《湖海诗集序》，载李纲：《李纲全集》（上），213页，岳麓书社，2004。按，断句或为“形容色泽。”

⑤ 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06册，33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⑥ 陈善：《扞虱新话》，载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511页，中华书局，2017。

⑦ 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载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328页，齐鲁书社，2002。

⑧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载元稹著，冀勤点校：《元稹集》，691页，中华书局，2010。

宋人苏颂评价书法之语，后黄庭坚用之评赞杜诗，指杜诗能兼诗之众体。若再加引申，还可形容杜诗溢出诗体之外，具备众多文章之体的妙用。盖大诗人作诗，正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堂庑特大，令人目眩神怡。

宋代开始，已屡有将杜诗与文章做比较者，如北宋黄彻《碧溪诗话》谈道：“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既不限声律，复不拘语句，尚罕得反复折难，使其理判然者。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① 场屋之文，天天练习，既不用押韵，又少字句限制，尚且难得佳作；而杜甫的《奉先咏怀》确有以诗为文的倾向，忧心天下，抒碧血丹心，叙议兼优，曲传心声，堪称一篇无与伦比的“心迹论”——心灵变奏曲也。南宋刘克庄对杜甫的《秦州杂诗》特别推崇：“若此二十篇（指《秦州杂诗》），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送蕲师》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岂不信然？”^② 图经指带有地图、图画的地理志书，也可理解成记述地方风物的图文并茂的著作。杜甫的《秦州杂诗》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以诗述江山风物，以系列组诗为风物志，故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另一组《发同谷县》，同样具文章之妙，刘凤诰认为：“少陵《发同谷县》十二首，较秦州诗更为刻划精诣……的是上下栈程，入天穿水，一月中早行暮宿光景，语皆未经人道，却处处目想可到”^③。以组诗纪行踪、描风景，做到了叙事刻划曲尽情事，可称以诗作记。

霍松林早年之文《论杜甫的创体诗》，颇具新意。其中论及杜甫《饮中八仙歌》《八哀诗》和新题乐府等，还包括连章律诗与长篇排律。细思这些所谓的“创体诗”，不难发现多是借鉴文章作法，才得以创新出彩的。换句话说，用文章技法作诗，破体为之，如出奇兵，遂令杜诗焕生机、呈新貌。以《八哀诗》为例，古人对其奥妙，看得尤其真切。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杜《八哀诗》，崔德符谓可以表里《雅》《颂》，中古作者莫及。韩子苍谓其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④ “表里《雅》《颂》”，是言其正大，如庙堂制作；而比作“太史公诸赞”，即有韵之文，又是赞其褒贬得体。明末郝敬亦云：“《八哀诗》雄富，是传记文字之用韵者。文史为诗，自子美始。”^⑤ “文史为诗”的提法亦值得关注。王嗣奭《杜臆》谈道：“此八公传也，而以韵语纪之，乃老杜创格，盖法《诗》之《颂》；而称为诗史，不虚耳。”^⑥ 上述诸家可谓所见略同，皆能去皮见骨，深入一层，抉出《八哀诗》以韵语为列传的创新。但颇具意味的是，也有对《八哀诗》弹射臧否者。譬如叶梦得就批评：“《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于多也。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各取其半，方为尽善。”^⑦ 盖用诗作八篇传记，叹旧怀贤，议论诸人出处大节，岂是易事？杜甫尝试了，做到了，难能可贵。但终因以诗叙八人之事，乃是创格，难度极大，又为用韵所束缚，不免芜词累句，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其实是大胆创新带来的难以避免的疵病，故不能因此就否定杜诗的创格。杜甫以诗为传、为赞、为悼文，创造力之雄强，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杜诗之“用”，还可如年谱、日记、小传、筹边策、学记、信笺等，应用之细之广，大大拓展了诗国疆域，“毫无违和感”地侵入了文章领地，或可谓句式整齐的押韵之文。江盈科《雪涛诗评》云：“杜少陵是固穷之士……所历苦楚，都于诗中写出。故读少陵诗，即当少陵年谱看得。”^⑧ 杜诗

① 黄彻著，汤新祥校注：《碧溪诗话》，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②④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6997、6799页，中华书局，2011。

③ 刘凤诰：《杜工部诗话》，载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208-209页，齐鲁书社，2002。

⑤ 转引自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1420页，中华书局，1979。

⑥ 王嗣奭：《杜臆》，2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⑦ 叶梦得：《石林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411页，中华书局，2004。

⑧ 江盈科撰，黄仁生点校：《江盈科集》，702页，岳麓书社，2008。

如年谱，可谓有得之见。又有的篇什如日记，看诗题即知，如《十二月一日》《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而《壮游》，刘凤诰谓“乃晚年自作小传”^①，指为总括性的小传。王嗣奭评《塞芦子》：“明是条陈边事，岂可以诗论？”^②杜诗又成诗中筹边策矣。黄彻认为杜诗《题衡山县学堂》“岂不是草堂、县学记？”^③然则杜诗有学记之用。蒋瑞藻评《宾至》云：“八句俱作告客语，又是一格，一气如话，倍如隽永。”^④则是以诗为小柬。总之，杜诗创格何其多、日常应用何其广，正常该用文章的时候，杜甫有意搁置，偏偏以诗代文，使诗歌的表现和功能，一如文章般宽广。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细论杜诗兼备文章诸体云：“杜工部五言诗，尽有古今文字之体……他若《上韦左丞》，书体也；《留花门》，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褥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王琬》，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⑤一气指出了十种文体，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契合了古人论杜所言的“千汇万状，茹古涵今”^⑥，足见杜诗的体制多变，以诗曲尽文章之妙。诗之日常功能性、应用性，在杜甫手上得到极成功、极广泛的运用和体现；而以文章之体作诗，正是扩大诗之表现力的重要途径，“精熟文选理”在杜诗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王士禛赞杜甫“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⑦。诸多杜诗新体，其实都是有文章之用的特殊新体。故杜诗能兼备文章众体，可代替文章，达成文章之用，实现文章价值。而这正是杜诗独辟蹊径的突出特色。

四、注杜奥妙：以文章之法疏导

祝尚书说：“发育较早的诗赋格法，以及江西诗派句法，既是解析诗赋、也是解析文章的方法……诗赋格法为文章学提供了现成的研究范畴和术语群，如认题、破题、立意、布置、造句、用字等等，在诗格、诗话、赋格中常见，而也见于文章学著作之中，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⑧早期的诗赋格法为文章学的研讨提供了重要借鉴，甚至可以直接套用；而反过来，成熟后的文章学又为诗的注释解析提供了有益的反哺、参照。两者其实是错综为法，是互为参佐、促进的辩证关系。

杜诗注释，在古代诗人中为大一宗，体式亦丰富多样。明清两代，文章学兴盛，论著层出不穷，这也影响到了诗学，表现之一就是文法注诗。值得注意的是，在杜诗的注释方面，文章学就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特别是明末以来，杜诗的注本体例更臻细密，研讨更趋专精，这不是偶然，其中颇有对文章学体式和方法的参照。

到了清代，注杜尤其兴盛，且成果丰硕。有的注本，诗题下有解题，字句间有注疏，章节后有小结，诗作中有旁批、眉批、加圈、加点，诗后再有集解，最后还有汇评……这些形式多样的注释体制，不能不说没有受到经学注疏和文章学选本注本的影响。

① 刘凤诰：《杜工部诗话》，载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203页，齐鲁书社，2002。

② 王嗣奭：《杜臆》，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③ 黄彻著，汤新祥校注：《碧溪诗话》，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④ 蒋瑞藻：《续杜工部诗话》，载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374页，齐鲁书社，2002。

⑤ 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1371-13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⑥ 蔡梦弼集录：《杜工部草堂诗话》，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194-195页，中华书局，2006。

⑦ 王士禛：《新编渔洋杜诗话》，载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446页，齐鲁书社，2002。

⑧ 祝尚书：《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载《文学遗产》，2012（1）。

有学者细致梳理了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四家讲解杜诗章法的术语：点、提、提掇、笼、包、兜、绾、收、束、起、领、引、兴、应、呼应、顾、顶、冒、带、挑、逗、拖、申、根、伏、剔、蹶、摄、度、渡、贴、黏、合、拈、蒙、承、接、因、了、切、撇、反、解、还、关生、映切、张本、转、过脉、波折、作地、为……作引、与……作章法、相间成章。^① 显而易见，文章学评点对杜诗注释的影响与作用，是不言自明的。上述四家关于杜诗的起承转合，包括结构、节点、衔接、呼应等技法，以及解析的体式、语言、内容等，都能看出八股文理论的重大影响。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是杜诗学里程碑式的重要注本。但晚清施鸿保批评仇氏：“本工时文，殆以说时文之法说杜诗也。”^② 虽然略含褒贬，但也是实话实说。《杜诗详注》以文法解诗，明显受到时文制义的影响，而借鉴八股文说诗，亦一时风气。金圣叹批点杜诗已是如此，何况仇兆鳌的注杜，确有足多者。

再以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为例，“他在讲解段落大意时往往用八股文的套子来分析杜诗，分所谓‘接’‘顶’‘提’‘应转’等等，甚至把一首诗割裂得支离破碎，曲解作者原意”^③。所谓八股文的套子，当日正是文章学评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同样对浦氏的注杜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浦起龙除了《读杜心解》，还选评了《古文眉诠》，这是清代有代表性的古文评点选本，属于文章学著述的范畴了。可见浦氏是诗文兼注的，尽管评点对象不同，但思路和体例应当是相似的，他的古文评点与注杜不可能全无关系，相互参酌是水到渠成的。

当然，高明的杜诗注家不会简单照搬文章学著作的评点程式，而是参考斟酌，体例再加翻新创造，自成一格。清代吴见思《杜诗论文》、吴瞻泰《杜诗提要》、黄生《杜诗说》等，都在评点解析杜诗上作出了新意和特色。

吴兴祚为《杜诗论文》作序云：“今学杜与注杜者，皆泥乎诗之见，所由失之愈远也。独家齐贤诵其诗能会心，其所为文，即以文章之法次第疏导之，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而千载之活杜公出矣。”^④ 这是颇有见地的，有时一味就诗论诗，反如“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得要领；而“以文章之法次第疏导之”，改其故步，或能融汇突破，别开生面，令“千载之活杜公”呼之欲出。其实，《杜诗论文》的书名已然透露了作者的理念，即以论文之法论杜，岂有他哉！

吴瞻泰《杜诗提要》卷首有云：“至其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则有合左氏之法者，有合马班之法者。其诗之提挈、起伏、离合、断续、奇正、主宾、开阖、详略、虚实、正反、整乱、波澜顿挫，皆与史法同。而蛛丝马迹，隐隐隆隆，非深思以求之，了不可得。”^⑤ 偏重把杜诗与《左传》《史记》《汉书》做比较，独具匠心地拈出了杜诗与史书作法的相通，所用的批评术语更是大有来自史传评点者，这又是吴瞻泰对杜诗钩玄提要的不二法门。

五、批评的新境界：文法论杜的诸多面向

上节谈以文法注杜的杜诗学注本偏于宏观，本节再聚焦文章学之法论杜的诸种具体表现。其实，杜诗与文章学这个题目交集最密、材料最多的，就是后世论家以文章学之法评杜。在这方面，宋人启其端，而尤以清人用力最勤、创获最多。鉴于头绪繁多，本节撮要论之。

文章必谨布局，诗又何尝不是如此？宋代范温《潜溪诗眼》记录了黄庭坚的一则经验之谈：

① 杨永发：《杜诗四家注之内容系统与功能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② 施鸿保：《读杜诗说》，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③ 王志庚：《点校说明》，载浦起龙：《读杜心解》，2页，中华书局，1961。

④ 吴见思：《杜诗论文》，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册，7页，齐鲁书社，1997。

⑤ 吴瞻泰：《杜诗提要》，3页，黄山书社，2015。

“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①韩愈的《原道》，为学习文章布置的典范。范温受此启发，考古人文章法度，极为推崇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范温云：“此诗前贤录为压卷，为其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他虽谓之变体可也。”^②此处的布置，可理解为诗之章法布局，杜诗一篇有一篇之命意，一句有一句之安排，《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确是布置井然，见出与《尚书》、韩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文章学之法论杜，剖析深细，且较有体系的，还属清人。这是因为后出转精。在清人诗话中，颇有以文法论诗为理念的论著，如桐城派论诗，即多采用文章学或诗文比较的方法，方东树《昭昧詹言》可为代表，其书善以古文之法解析诗歌，而杜甫又是书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研讨对象之一。方氏论杜、解杜，注重根本，内容务实，很能抉出杜诗与古文间的细致幽微关联。方东树云：“欲学杜韩，须先知义法粗胚，今列其统例于左：如创意（去浮浅俗陋）；造言（忌平显习熟）；选字（与造言同，同去陈熟）；章法（有奇有正，无一定之形）；起法（有破空横空而来，有快刀劈下，有巨笔重压，有勇猛涌现，有往复跌宕，有峥嵘飞动）。”^③下面又谈到转接、气脉、笔力截止、不经意助语闲字、倒截逆挽不测、豫吞、离合、伸缩、事外曲致、意象、顿挫、交代、参差等，基本是用论古文、时文之法论诗，几乎将评制义、试贴诗所用的术语，发挥到了极致，缜密细腻，无以复加。由此可知，以古文义法论诗，早已不是蜻蜓点水般的泛泛之论，而是到了深入肌肤、造微入妙的程度和境地，创意、造言、选字、章法、起法、转接、气脉……着眼于创作的全过程，有一整套的批评话语系统。当然，毋庸讳言，如此论诗，有时亦失之细碎，略显过犹不及。

以文章学之法论杜，面向多元，章法、句法、字法，乃是最常见的角度。方东树释章法云：“亦不过虚实顺逆、开合大小、宾主人我情景，与古文之法相似。”^④诗的章法果然与古文之法相类。方氏所言并非浮泛之词，而是具有创作基础者的甘苦之言。诗与文的章法，皆讲虚实、开合、宾主，而关键还在作者，要有“死蛇弄活”的本领，做到心中有法，却又不拘于法，才能实现恣肆奇警。

叶燮《原诗》用了近五百字的篇幅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章法。限于篇幅，不征引。^⑤此诗写曹霸，抵得上一篇精彩的传记，将其生平得意事曲曲传出，又有旁见侧出之笔微妙衬托，章法高妙几如史传。叶氏之论贵在能结合转韵论杜诗之章法，又浮想联翩，以登山观山为喻，屡加新奇之譬喻，如奇峰高插、遥望中峰、划然天开、中峰绝顶等，反复形容，犹如欣赏一巨幅山水，山之层峦叠嶂、高低起伏，历历在目，而杜诗章法的宾主座次、错综之妙，也就了然于胸了。叶论虽出于古文章法，却又能自出机杼，更能阐发杜诗的精妙，故有新意。

吴瞻泰《杜诗提要》、黄生《杜诗说》也是以文章学之法论杜的高手，兹举数例。吴书评杜诗《古柏行》：“首段咏柏时，忽然横插‘君臣’句，是古文断续法，且又伏下先主武侯一段。”^⑥可谓波澜顿挫。黄生评《北征》：“此诗分四大段，辞阙一段，在路一段，到家一段，时事一段。若各叙自可互为数题，亦无害各为佳篇。然杜公偏以合叙见本事……自是古文结构”^⑦，见出诗意完满如贯珠。又，黄生评《铜瓶》：“突起一句，随手撇开，至结尾始挽合……乃古文遥呼徐应之法也”^⑧。诗之开合如云卷云舒。上述的古文断续法、古文结构、古文遥呼徐应之法，应该是相似的，借以形容杜诗章法，令人觉得切中肯綮，毫发不爽。诗中的停顿转折、跌宕摇曳，或断或续、遥呼徐应，

①② 范温：《潜溪诗眼》，载郭绍虞编：《宋诗话辑佚》，323-324、267页，中华书局，1980。

③④ 方东树：《昭昧詹言》，213、3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⑤ 参看叶燮：《原诗》，7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⑥ 吴瞻泰：《杜诗提要》，133页，黄山书社，2015。

⑦⑧ 黄生：《杜诗说》，16、135页，黄山书社，1994。

正是杜甫借鉴文章作法的细节证据,遂令诗之章法有文章之妙,故不以文法论之、形容之,杜诗的层次井然、抑扬顿挫,就难得发明阐扬。

古代评论家动辄大谈“古文文法”通于诗,而杜甫确实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开启后世法门。论家以文法论杜,可谓跨界出奇思、破体显妙谛^①,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当然,这也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沈德潜《说诗晬语》就认为:“杜诗别于诸家,在包络一切,其时露败缺处,正是无所不有处。评释家必代为辞说,或周遮征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时文法解说杜诗,断断于提伏串插间者。浣花翁有知,定应齿冷。”^② 沈氏认为杜诗并非一字不可改易,承认其有弊病。本来,人非圣贤,杜诗有瑕疵也无足怪。杜诗号称无所不包,其间必定有泥沙俱下处,故有弊病才是正常的。而后世以八股时文之法论杜,等而下之者恒订獭祭,大谈提伏串插,喋喋不休,有时甚至曲为遮蔽,看似头头是道,但其实去杜甫的真面目愈远,故不足取。因此,对于以文论杜,需要一分为二地辩证看待,不宜生搬硬套、枝枝节节,更不能割裂诗意,沈氏的批评可谓剀切之谈。

六、聚焦“太史公笔法”与“最擅叙事”

以文章学之法论杜,可谈者甚多,笼统言之,总觉不够深入细致。在爬梳材料中,有两点印象深刻,即杜诗得“太史公笔法”与“最擅叙事”,可谓文法论杜的两个具体而重要的维度,故专门拈出,作为分论细绎。

诗论家屡言,杜诗在叙述结构、章法上,受到《左传》《史记》的深刻影响,而言《史记》者尤多。学界对杜诗引《史记》,亦有考论。总之,杜诗与《史记》是耐人寻味的话题。

需要指出,关于杜甫、杜诗的各种“话头”,多由宋人发端。北宋黄彻《碧溪诗话》记录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③。说明苏轼已经关注到了当时有人把杜甫比作司马迁,或者说杜诗如太史公书。黄彻进一步以为,杜甫的仁心如孟子,这是从杜诗中读出了儒家的仁义之论。

把杜甫比作司马迁,部分原因是基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即两人都曾较长时间的漫游。北宋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云:“昔司马子长、杜子美皆放浪沅湘,窥九疑,登衡山,以搜抉天地之秘,然后发愤一鸣,声落万古,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④ 当然,司马迁、杜甫相差八百余年,他们漫游的契机、路线、持续的时间等并不相同,但宋人特别注意到两人都曾“放浪沅湘,窥九疑,登衡山”,一些类似的登山泛湖经验,就形成了江山之助,带给他们某些共同的感悟和体验,故落笔为文为诗,其中就有了些许不易察觉的“异代知音”之质素。

谈司马迁《史记》予杜诗之影响,不宜浮光掠影,止于老杜似司马迁、少陵诗似太史公文,而应谈出更具体的艺术关联,深挖其中的机关隙窍,才能服人。刘熙载《艺概》云:“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⑤ 这就不是停留在浅表层面了,杜诗古体叙事的波澜起伏,风格的悲壮雄浑,不妨说有得自《史记》的重大启迪。

朱庭珍《筱园诗话》评杜诗:“往往叙事未终,忽插论断,论断未尽,又接叙事。写情正迫,忽入写景,写景欲转,遥接生情。大开大合,忽断忽连,参差错综,端倪莫测。如神龙出没云中,

① 关于破体对文学创新的意义,可参见谷曙光:《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本色与破体》,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3)。

② 沈德潜:《说诗晬语》,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③ 黄彻著,汤新祥校注:《碧溪诗话》,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④ 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1册,2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⑤ 刘熙载著,袁津琥笺释:《艺概笺释》,303页,中华书局,2019。

隐现明灭，顷刻数变，使人迷离。此运《左》《史》文笔为诗法也，千古独步。”^①这又是说杜甫以文笔为诗法，于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上自由衔接、转换，运笔之妙，自然天成，无迹可寻。故杜诗笔法之高明，能得《左传》《史记》之遗意。

以上两则可谓总论，而谈杜诗单篇学《史记》的更多。以《饮中八仙歌》为例，张谦宜云：“用史记合传例为歌行”^②。李因笃云：“无首无尾，章法突兀妙是，叙述不涉议论，而八人身分自见，风雅中司马太史也。”^③前已言之，《饮中八仙歌》乃创体之作，一篇咏盛唐八人，以酒为媒，或两句、或三句，最多的李白四句，安排布置，错落有致，而风雅情旨，寄于笔墨蹊径之外，可谓开向来歌行未有之奇。由此观之，杜诗真如“史记合传”。

再举数首。钟惺评《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自传叙事体入诗奇”“千载如生，是太史公传荆轲、鲁连笔意”。^④此诗似传似记，叙述往事，曲折矫健，果有太史公之雄健笔力。浦起龙说《壮游》：“此诗可续八哀，是自为列传也。”^⑤杜甫不但能以诗为旁人作传，也可为自家写照。方东树《昭昧詹言》认为《李潮八分小篆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章法之妙，直与史迁之文相抗矣”^⑥，亦是就章法的角度认为杜诗叙次明晰、转折灵便，类司马迁之文。总之，杜甫作诗“善序事理”（班固语），游刃有余，而杜诗可比有韵之《史记》。

上述之论，不一而足，可见在叙事、风格、章法、笔力、结构等方面，《史记》予杜诗以多方面的启示和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杜诗与《史记》在更高的艺术层面有内在的相似性。刘克庄《郑大年文卷》云：“余尝谓作文难，论文尤难。貌似者不若意似……意似者，杜诗之似《史记》也。”^⑦此处的“意似”，就类似内在风神的相似了，有时甚至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唐人孟棻《本事诗》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⑧宋陈岩肖《庚溪诗话》亦赞杜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⑨杜诗得“诗史”之美誉，固然与他善陈时事分不开，恐怕更与他的诗具备史笔、史识大有关系。司马迁的《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笔法峻洁，其实录精神尤为人所称道；而杜甫，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以诗歌继承了史官的春秋笔法，蕴藉深厚，乃令杜诗具《史记》之风神和骨力。这在诗人中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曰：“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前人谓杜甫之为‘诗史’，盖为是也。非但叙陈迹摭故实而已。”^⑩这里就点出了杜诗不止有史实，且兼具史识和史情。“推见至隐”是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也体现了太史公的史学观；而古人移用于评价杜诗，足以说明杜诗的“诗史”属性，正与《史记》的史学精神有着内在的高度一致性。

与“太史公笔法”关联紧密的，是叙事。从宋代到清代，在文章学中，一直有“作文字不难于敷文，而难于叙事”（吕祖谦）^⑪、“文类既殊，体裁各别，然惟言事与记事为最难”（包世臣）^⑫、

① 朱庭珍：《筱园诗话》，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23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② 张谦宜：《緹斋诗谈》，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14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③ 《唐宋诗醇》引李因笃言，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14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④ 钟惺、谭元春：《诗归·唐诗归》卷17，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刻本。

⑤ 浦起龙：《读杜心解》，162页，中华书局，1961。

⑥ 方东树：《昭昧詹言》，2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⑦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4518页，中华书局，2011。

⑧ 孟棻：《本事诗》，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15页，中华书局，2006。

⑨ 陈岩肖：《庚溪诗话》，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167页，中华书局，2006。

⑩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318页，中华书局，2004。

⑪ 吕祖谦评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7册《御选唐宋文醇》卷40，70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⑫ 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小倦游阁集》卷9，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章学诚）^①、“文章莫难于叙事”（邵长蘅）^②等类似观点。叙事最难，几乎成为文章学的共识。试问文章家里，谁最擅叙事？明代归有光认为：“学者作文，最难叙事。古今称善叙事者，惟左氏、司马氏而已。”^③还是左丘明和司马迁最擅胜场。作诗也免不了叙事，诗歌中的叙事同样不易。在诗人中，最注重、最擅长叙事的无疑是杜甫，故杜诗才得“诗史”之誉。随着古文之学的兴起，擅长“以文为诗”的杜甫，愈发受到文章学家的关注和看重，并非偶然。

诗歌在抒情之外，注重叙事功能，固然是增强诗歌的表现力，而后世条分缕析地研究诗歌的叙事，则是诗学研讨商量日益邃密的一种体现。刘熙载云：“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④可知杜甫以前的律诗，很多在叙事上还不能做到“圆美流转如弹丸”的程度，言下之意，老杜是令诗歌叙事臻于完备的关键人物。

诗文叙事当然有法，方东树总结云：“欲知插叙、逆叙、倒叙、补叙，必真解史迁脉法乃悟，以此为律令……坡、谷以下皆未及此。惟退之、太史公文如是，杜公诗如是”^⑤。这里谈的插叙、逆叙、倒叙、补叙，颇能阐幽探赜，本古文之法，司马迁、韩愈本色当行。而方氏认为，在诗歌中唯有杜甫能运用自如，连苏轼、黄庭坚都有所不逮，话虽有点绝对，但确实有道理。说到具体作品，方氏评杜诗《九日》云：“用文章叙事体，一气转折，遒劲顿挫，不直致，不枯瘦。乃知严沧浪所讥‘以文为诗’之论，非也”^⑥。诗中好的叙事有感而发，声情高亮，艺术感染力极强，自不得因“以文为诗”而否定之。

杜诗是如何做到叙事高妙的？诗文兼擅的苏辙在《诗病五事》中说：“老杜陷贼时，有诗曰……（《哀江头》）。予爱其词气如百金骏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⑦苏辙的眼里，连白居易都“拙于纪事”，而杜甫则有大本领，其诗之纪事能如骏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而关键在于做到断续曲折、转换灵便，如人体内在血脉骨骼之筋节相通、腠理连贯。苏辙褒杜而贬白，以杜诗《哀江头》为叙事高妙的典范，虽未提白居易之名作《长恨歌》，但明眼人已可体会，盖两诗题材相类。《长恨歌》上千言，铺写详密，自是佳作，乐天本就要“说尽”；而《哀江头》叙事简括，如骏马跳涧，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少陵追求的则是简净蕴藉。笔者不对两诗妄评高下，但作品背后反映的是杜、白秉持的叙事策略有所不同。

善叙事的一大表现，是记叙之次序井然。洪迈《容斋随笔》言：“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为布置铺写则同……读此诗文数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矣。”^⑧诗是诗，记是记，但两者在布置铺写上，却有殊途同归之妙。洪迈举了杜甫的《观曹将军画马图引》《丹青引》《画马赞》等为例，看重的就是杜诗的脉络清、层次明、条理顺，叙事该而不烦。

不但单首作品讲究次序，组诗亦有顺序，不可颠倒，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就是如此。刘凤诰云：“次第章法井然，不似后人作连章，可随意多寡、颠倒位置也。”^⑨十首合成一篇游

① 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载章学诚：《章学诚遗书》，685页，文物出版社，1985。

② 邵长蘅：《与贺天伦文书》，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25册《邵青门全集》卷11，72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③ 归有光：《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17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④ 刘熙载著，袁津琥笺释：《艺概笺释》，305页，中华书局，2019。

⑤⑥ 方东树：《昭昧詹言》，233、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⑦ 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1229页，中华书局，1990。

⑧ 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914-915页，中华书局，2005。

⑨ 刘凤诰：《杜工部诗话》，载张忠纲编注：《杜甫诗话六种校注》，257页，齐鲁书社，2002。

记，每首又有单独侧重。^①另两组纪行诗《发秦州》《发同谷县》情况也类似，崔德符曰：“皆以经行为先后，无复差舛”^②。以经行为先后，情事婉转，刻划精诣，不能不说是吸收了文章叙事的简而有法。他如《前后出塞》等，首尾次序皆井然，组诗信如文章。

七、杜诗与文章学：聚观通证、理一分殊

从《诗品》开始，历朝的诗歌批评，很多都是感悟式的，崇尚“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看重“滋味”“妙悟”，讲究“神韵”“意境”“涵咏不尽”。然而“玄之又玄”的诗歌体悟，如“众妙之门”，有时却不易把握，也有蹈空踏虚之虞。相对而言，文章学的研讨和评点，似更“脚踏实地”，更有“抓手”，更为细密而显出法度森严来。如果承认文章学在宋代成立，把文章学成熟后的评批引入诗歌，借文法评诗，无疑具别出机杼的空间。而杜甫其诗，就成为以文法论诗最卓绝、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杜甫其人也成为游走于诗与文章之间最相得益彰的典范。

文章固然讲载道，而杜甫则在诗的方面将载道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前曾引北宋陈善“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之论，清人方东树亦云：“杜公以《六经》《史》《汉》作用行之，空前后作者，古今一人而已”^③。具“周情孔思”的杜诗，“发于性止于忠孝”^④，是让历代读书人、文章作家和诗人都倍感亲切的，杜甫可谓“跨界大家”。今人动辄讲文艺学术之“思想性”，古人何尝不讲？杜诗本性情、厚伦理、秉忠孝，正可谓品格高尚者所作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诗。借用哲学术语，这正是杜诗与文章学天然亲近的“意识形态”基础。

杜诗创格甚夥，多是借鉴文章之法，故杜甫又乃最善于借文体恢弘诗体者，于是能兼备众体，包诸体之妙。方东树甚至说：“诗与古文一也，不解文事，必不能当诗家著录。”^⑤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杜诗可谓律法森然。不过，杜诗之法不止诗法，诗人还凭借深严邃密的文法，兼收并蓄，才让杜诗焕发辉光、大放异彩的。后世学人以文法注杜、评杜，杜诗的解析更能发明其妙，更为有的放矢。方氏还有一精辟之论：“大约古文及书、画、诗，四者之理一也，其用法取境亦一。气骨间架体式之外，别有不可思议之妙。凡古人所为品藻此四者之语，可聚观而通证之也。”^⑥古文、书、画、诗，道理相通，可合而论之，这是很重要的发挥。从杜诗看，“以文为诗”杜甫固优为之，足见其文章修养深厚。诗人对书画也是精通的，杜诗书画题材的作品每有艺术的真知灼见。故文章、书、画、诗，在杜甫这里，实现了聚观通证，可谓理一分殊。杜诗的成功，离不开一个“通”字。

早在陈师道《后山诗话》里，就引了黄庭坚之言“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⑦。虽然是否定诗文互用的尊体观点，但黄、陈诸人不得不承认，创作中大量存在诗文互援互渗的现象。更何况黄、陈等都是“此道”中人！他们言辞上虽不以为然，但创作中却在“日用而不觉”地践行诗文互用。其实，从杜甫到韩愈，再到宋代的欧、王、苏、黄、陈等，走的都是诗歌与文章相结合、相生发的道路。欲自成一家、恢弘文学，就要在尊法度的基础上主变化，而破体是开文学新貌的不二法门。由此言之，研讨杜诗与文章学的关系，又具有探寻文学创新和演进规律的重要意义。

客观而论，杜甫及其诗成为践行诗文一理、聚观通证的典型代表。如果以文章学为中心，杜诗竟意外成为文章学中的“跨界好榜样”，在后世的文章学论著中，杜诗的技法、优长，时常作为文章学的范例，加以评介推许。如果说“唐宋八大家”是文章学的铁杆偶像的话，那么，杜甫及其诗

① 可参看谷曙光等：《“遂为咏园林之冠”——杜甫两游何将军山林十五首论略》，载《杜甫研究学刊》，2015（1）。

②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③⑤⑥ 方东树：《昭昧詹言》，211、376、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④ 苏轼：《王定国诗集叙》，载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318页，中华书局，1986。

⑦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303页，中华书局，2004。

竟也成为文章学中触类旁通的另一种典范。

诗讲究凝练和形象，以抒情为主；而文章擅长叙事、议论，束缚较少，两者究竟是不同的文体。但从杜甫身上，令我们看到了诗文相通相融的一面，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解，抑或比较，乃至理论，诗文互援互释都是可行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诗文一理，打通并相得益彰。杜诗的创新离不开文章的滋养，杜诗学的研究借鉴文章学的地方亦多，后世文章学的研讨断不能忽视杜诗的存在。诗与文章，在杜甫这里既有横向共时的交融，又有纵向历时的贯通，实现了道理相通、错综成就、合而见义。一言以蔽之，杜甫既是崇高的诗学典范，亦成为文章学榜样。这背后暗藏着伟大诗人的博洽周流、神通广大，展现着文学创新、文体互通的路径，更昭示着文体创变、文学演进的深层规律，真可谓理一分殊、月印万川，“别有不可思议之妙”。

时至今日，诗歌与文章各自文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文体间的壁垒日益森严，两者的互动和交融较为少见，其实，这是不利于文体发展和文学演进的。杜诗之于文章学的典型与特殊，在于杜诗本身的“载道”与“日用”，在于文体间的同条共贯、道理相通，更在于诗人实现了聚观通证、匠心独运。无论诗歌创作抑或文章写作，都不宜“闭环”，局限于“内循环”；而是要开放文体，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双向良性互动，这对于产生大诗人、大作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此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杜诗与文章学的关系，对于今之创作、写作、研究，是有古为今鉴、经世致用、传承文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An Evidential, Comprehensive View on the Principles that the Writings of both Poetry and Prose Follo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 Fu's Poetry and Prose

GU Shugua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Du Fu's poetic writ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prose. His poems have strong qualities of daily practical writing, and in many cases, can be read as proses. His poetic writing combines various literary forms and greatly expands the expressional power of poetry. For this reason, later generations approach to Du Fu's poetry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writing of proses. The discussion of Du Fu's poetic writing that also absorbs the techniques and styles of his writing proses should focus on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the Grand Scribe's writing style and at the perfection of narrating. It is observable that Du Fu also applied the principles of writing proses in composing his poems. When late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annotate and discuss both Du Fu's poetry and prose, they emphasize this aspect in his writing. In a word, Du Fu is not only a paradigm of poetic writing, but also a role model in the writing of proses.

Key words: Du Fu's poems; Study of prose; Relationship; The same principles used for writing both poems and proses

(责任编辑 张 静)